



试论台湾佛教居士团体的勃兴

何绵山

台湾解严后佛教的兴盛与居士团体的勃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现将其居士团体的勃兴具体情况陈述如下。

(一)居士团体的兴起。台湾解严前最主要的居士团体是“中华佛教居士会”,创办者李贻居士,河北顺义人,出生于1908年,1998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去世,他曾任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校长等职,1963年皈依印顺法师,主理“中华佛教居士会”达18年之久。“中华佛教居士会”成立于1968年1月5日,至1978年9月才于台中市成立台湾省分会。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华佛教居士会”实际上是由国民党掌控的两大佛教团体之一(另一个为“中国佛教会”),一开始就有着浓郁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官方特点,如经常与“中国佛教会”一起代表台湾出席在岛外各种与佛教有关的会议,经常代表台湾当局表态或发表声明,并组织当局所希望的活动,如组团赴金门“劳军”等,实为当局的传声筒。所以每当“中华佛教居士会”举办大型活动,台湾当局都会派出要员参加。但自成立以来,此会也不遗余力地举办了许多弘法、护法活动,如定期请法师或居士讲经,开设英文佛学讲座,组织念佛团帮助会员临终往生西方,召开佛学座谈会^[1],成立梵呗班,举办普度法会,组织环岛弘法访问团,组织请捐奖学金活动等。台湾解严后,随着台湾威权政治的崩溃

和台湾佛教的快速发展,居士团体也开始走向兴盛。至21世纪初,有代表性的居士团体众多,如“中华佛教居士会”(台北市)、“中华佛教居士林”(台北市)、文殊居士林(台北市)、复仁居士林(新店市)、中观居士会(台北县)、台南居士林、澎湖居士林、清心佛教居士林(桃园县)、如来家业弘法居士林(台北市)、基隆佛教居士林、慈航居士会(台南市)、台南佛教居士林、妙慧居士林(台南县)、林园居士林(高雄县)、花莲佛教居士会等。此外,许多名目繁多的学佛会、念佛会、佛学会、共修会、同修会等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有的以行业为组织,如电信学佛会;有的以共同宗旨为组织,如中华慧炬佛学会(专门向大专青年弘法);有的以区域为组织,如桃园念佛共修会;有的为纪念过世名僧而命名,如广钦禅净学佛会;有的以地名为组织,如位于台北市峨嵋街的峨嵋念佛会,位于三重市的三重学佛同修会;有的以所修内容为命名,如净宗共修会,“中华正法源学佛会”;有的跨区域、跨行业,如佛教正觉同修会、在家菩萨同修会、莲品念佛会。这些居士组织都开展了各种积极的活动。再以“中华佛教居士会”为例:一是与其他组织一起举办,“中华佛教居士会”往往和“中国佛教会”、“中国佛教青年会”联合举办大型活动,如1996年11月8日在台北市大安公园音乐台广场举行世界佛教静坐日大会,有近二

千人与会;1999年举行“慈爱与悲悯——台湾青少年绘画比赛”,有近千名青少年参赛。二是介入重要活动的参办并为发起者,“中华佛教居士会”经常介入台湾佛教界的重要活动,并为主要发动组织者,如为庆祝佛诞二五四三年、佛教北传中土二千年、大乘佛教僧伽教育与制度传入台湾五十年,台湾佛教界于1999年4月8日在台北市召开庆祝活动,“中华佛教居士会”理事长于7时就前往“中国佛教会”迎请释迦太子像,然后恭捧香案紧跟比丘执锡杖队后,大会开始后致词,皆为大会不可或缺的角色。三是召开成立年庆大会,以联络会员之间的感情,如1997年2月16日召开二十七周年会庆暨会员大会,会中对1996年参加活动、赞助经费等有功的个人和团体发奖牌,获奖团体如大缘精舍、法雨同修会、缅甸佛教会、慈心佛教文化中心、诺那精舍等5个团体。四是组织与居士有关的活动,如组织居士助念团,以帮助居士临终时往生西方;再如组织禅学研究班,请禅学及坐功俱佳的老居士主持。五是参与海外活动,力图拓展在岛外的影响,如1998年11月,“中华佛教居士会”与“中国佛教会”、“中国佛教青年会”及佛光山代表出席了在澳洲悉尼南天寺召开的第二十届世界佛教友谊大会,居士会派出的三个代表都当选,黄书玮居士当选为世佛会副会长,游祥洲居士当选为执行委员,郑振煌居士当选为团结委员会主席。2000年10月,“中华佛教居士会”带领泰国供僧团共35人前往泰国清迈供僧,供奉878位泰僧每位泰币二百元。六是举办各种法会活动,以2000年1月为例,就举办了慈悲三昧水忏、仁国护国法会、诵戒、庆生报恩法会、大悲忏、年终祭祖等法会活动。各居士团体还经常联合开展各种联谊活动,以促进居士之间交流,如1997年春节,举行首届台湾居士界团体代表及个人联谊团拜活动,居士们以“不漏失一分一秒地行菩萨道,永不退转”自勉、互勉,企盼居士界团结,并将此活动推广到中、南部。1999年春节居士各团体联谊会在莲品念佛会举行,会上就世代交替、积极开展佛学教育及社会服务工作、在学术研究上加强精进、培育青年人才等方面达成共识。居士

各团体还常举行参访活动,如1999年3月28日,佛教居士界由莲品念佛会领团,参访了被称为“居士界学佛典范”的李炳南老居士纪念馆和老居士创办的佛教莲社、菩提医院、菩提仁爱之家等,回顾老居士辛苦经营的过程,勉励自己更加努力。有的居士组织以办成轻松自在的心灵休闲为目标,如陈履安居士于1999年9月在台北都市创办的化育居士林,有700平方米的面积,有茶艺馆,居士们可来此自由阅读佛书、饮茶、便餐及佛法对话、佛学解惑等,另尚有定期共修、佛学讲座等。另外居士家中新的衣物玩具、店家过期商品,都可送到居士林义卖。

(二)居士弘法。一是居士讲经弘法。长期以来,佛教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法师弘法,居士护法”,弘法一向被认为是出家人的本份与使命,在家居士尽管学佛多年,精通佛法,却永远被定为弟子,无法积极投入弘法工作。如今,这条界线在台湾被彻底打破。佛光山僧团首创了“檀讲师”制度,请在家居士上台讲经弘法,为居士提供了弘法的空间。凡檀讲师表现优异者,经评审合格,可以继续升任为檀教师、檀导师。檀讲师并非人人都可担任,所必需具备的条件,如:1、皈依三宝,信仰人间佛教,具有正知正见。2、佛光会员,认同本会宗旨,热心与人为善。诚信修睦,净持根本戒法,没有不良嗜好。信受法要,积极弘法利生,能够契理契机。佛光山僧团还为此找到了依据:“综观中国佛教四大名山的四大菩萨,除了地藏菩萨现出家相以外,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均现在家相,可见佛教是重视在家信众的,是僧俗融和的。另外,维摩居士、胜鬘夫人、妙慧童女等,皆以在家居士之身而在社会各阶层中宣说大乘佛法,若说他们是檀讲师的始祖,实不为过。因此,今日檀讲师之设立,可以说是不离传统佛教,而又能因应现代佛教的需要。”^[2]佛光山僧团认为居士讲法,将使佛教面貌发生极大变化,如:从僧众到信众,从寺庙到社会,从自学到利他,从静态到动态,从弟子到教师,从本土到世界。“创立‘檀教师’、‘檀讲师’的制度,授与才德兼备的居士有讲经弘法的资格,这不只是创见,也是佛教史上的创举。”^[3]此

外,一些团体也鼓励并安排居士讲经弘法,如“中华佛教居士会”长期举办由居士主讲的系列佛学讲座,有的是英文佛学讲座。各书院、讲堂、寺院、图书馆、学苑、精舍及各种学会等,都有居士在讲经弘法,有的长期为居士主持,在台湾似已成普遍现象。有代表性的如家庭计画协会长期举办免费佛学讲座,由台北市大乘精舍主持乐崇辉居士长期主讲佛学经典,4年后,由研习佛学的资深教授巢海容居士接讲。有的藏传密教道场也由居士主持,如台北市普贤书院以弘扬佛陀三乘显密教法为宗旨,每月不定期举办显密不同课程,均由钟力新居士、妙音居士主持。应该说,居士讲演的内容与法师讲演的内容并不完全一样,居士讲演的更贴近社会现实,如十方禅林1996年主持的《维摩精舍丛书导读》佛学讲座,主要由居士讲演,以林毓文居士所讲演的题目为例:1、人生的趣味、陷阱与究竟归趋;2、佛法的精髓;3、南北传佛教之汇通;4、禅宗消化痛苦的珍贵心法;5、丰富人生的灵性法钥;6、出生与死亡;7、心灵成长的正道与歧路;8、提升心灵境界的要点;9、禅修与身心灵整体健康;10、工作禅与生活禅。从这些讲题可看出,大多是试图通过佛法来解决生活中碰到的种种问题。二是居士主办法会。台湾许多法会也是由居士主办的,以高雄金刚乘学会为例,其2001年5月的法会,如5月2日的会供、莲师法会,5月4日的大白伞盖、财神、度母法会,5月11日的空行心要共修法会,5月18日的布萨诵戒法会,5月25日的观音、放生法会,都是由奕皖居士主持的。三是居士编印弘法出版品。许多居士创办出版社、刊物,编印各种佛书以利弘法,有代表性的如台北市大乘精舍传禄居士出资,向社会上广为征求《净土圣贤录五编》文稿,请适当人选定成编,广为印发。《净土圣贤录初编》为清代彭希涑撰,以记述净土教主阿弥陀佛及阐教圣众如观世音、大势至、文殊、普贤等菩萨为始,集录历代宣扬净土法门的比丘、比丘尼等凡500人的事迹。之后,有人以《净土圣贤录初编》体例为准,编写过续、三及四编,传禄居士在《征求文稿》中称:“前四编外,二十世纪中,全球华人内,念阿弥陀佛圣号,信愿行具

足,往生极乐者,须足以启信、策进后进,传记体精要写之”^[4],其对弘法的倾心可见一斑。居士撰写对经书的讲解,由寺院或佛教团体印刷,作为结缘品在社会上广为流通,如台北县中和市法明寺长期印刷出版品结缘,其中大多为居士所撰,以其2001年5月印刷的结缘品为例,有于凌波居士的《大乘广五蕴论讲记》、贤首居士的《弥勒行法》、张通文居士的《中阴身的自救法》、汤次了荣居士的《大乘起信论新释》等。也有许多居士撰写的非结缘品在社会上流通,每本均有定价,酌收一定费用,如朱义肯居士所撰《世尊拈花正法眼藏智慧教化》,每本收200元;再如江元灿居士主讲《念佛改变我一生》录音带,一盒五卷,每卷125元。由此可见,居士弘法还是较为便利,靠个人力量单打一即可。四是出现了一批从事学术研究的居士。这些居士虽然也从事演讲,但主要还是以其对佛学的研究和宣传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更大,有代表性的如南怀瑾对禅学的系列研究对社会上的禅修热起了直接推动作用,于凌波的《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中国近代佛门人物志》风行一时、流传极广,杨惠南长期对佛学的深入研究不仅提升了台湾佛学研究质量,还在知识界引起知识分子对佛学的关注,蓝吉富主编的《中华佛教百科全书》(十册)、《现代佛学大系》(六十册)、《禅宗全书》(一百册)为学佛、研佛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三)居士护法。一是居士团体护法蔚然成风。如台湾每个区域都有由居士组成的三宝护持会,活动频繁,护法不遗余力,仅以有代表性的台中市三宝护持会为例,其护法活动之繁多、场面规模之宏大、居士感情之虔诚、参加活动之认真,让人叹为观止。其2001年主要护法活动有:3月18日,协助般若行学佛会举办清明追思、感恩念佛大法会;4月7日,协助台中市佛教会举办庆祝佛诞节园游会;4月8日,协助“中国佛教会”举办庆祝2545年佛诞节浴佛大典;4月29日,举办尊重生命——珍爱自己痛惜别人系列活动、生命的教育讲座暨念佛法会;5月27日,举办尊重生命——2001年新世纪生命博览会;5月27日,协助慈航禅寺举办智聪法师荣任住持晋山升座大典;6月10

日至8月21日,全台礼僧,台北台中台南礼请长老及法师应供,拜访居士大德;8月26日,主办台中全台供佛供僧大会;9月2日,协助南普陀寺举办消灾超度法会;9月8日,举办台中全台供佛供僧大会圆满茶会;10月1日,协助慈光图书馆举办净空法师2001年演讲叙旧法会;12月2日,协助丰原慈龙寺举办常露法师升座大典;12月16日,举办第十一届护国息灾祈福大法会。所有活动中,每年都要举办的全台供佛斋僧大会实为不易,事先要开五、六次策划会,一般都在体育馆举行,参加者有十几万人,常常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大会场面极为庄严隆重,先由统一着装的百余名端庄大方的师姐(即女居士)在悠扬的音乐声中排队缓缓走出,再由居士对慈悲应供的几千名在场僧人一一供奉,组织严密,一丝不苟。这种护持会的开支收入渠道,再以台中市三宝护持会2001年开支为例,其2001年收入项目有:会员常年费(每年每人1000元基本会员费)470000元,会员随喜捐助款123340元,荣誉会员费(每次捐助一万元以上者)30000元,杂项收入15000元,赞助活动款870825元,利息收入9059元,总共收入1518224元,总支出1284021元,加上2000年度结余款227364元,共有结余款461567元。从中可知,会员年费和赞助活动款为主要收入来源。再如桃园县林口县体育馆每年都要举办全台供佛斋僧大会,每次都有万余名居士与上千位僧侣参加,已成为每年不可或缺的一项活动。二是居士以个人身份参加供僧活动。这类活动往往由僧人团体举办全台性的供僧大会,众多居士参加并慷慨解囊,众多法师慈悲应供。有时活动中还进行“供僧”意义的演讲,并有传统国乐团演奏梵音。三是居士对出家人以实质性的经济帮助,如台湾九二一大地震发生后,“中华佛教居士会”为帮助中部受灾寺院,拨出100万元为重建金,由理事长带队,共11人前往南投灾区,做慰问之行,先后参访慰问了名间灵山寺、中寮净土禅寺、国姓东方净苑,又在国姓乡逐一慰问了众多的法师,分别供养五万至十万元的重建金,表达了在家居士以实际行动护法的意愿。民间以个人名义捐款支持弘法事业的

也不乏其人,如为响应法鼓山圣严法师“预约人文世纪”的理念,施炳煌与其夫人捐出市值2亿元的股票。四是居士组织各种与佛教有关的多种形式活动,旨在扩大佛教的影响。如以宗山居士为首的南海佛教文化弘法学会曾举办“中国佛教禅画特展”,展出能表现契合禅意法趣的佛教人物、山水、花鸟等禅画。五是为僧人弘法保驾护航、出力出钱。如受“中国佛教会”、“中华佛教青年会”、净化社会文教基金会指导,由“中华佛教居士会”、明古村艺文薪传联谊会、台湾佛法中心主办的“国际僧众千里环岛行脚”祈福活动,一行41位出家人(其中比丘尼6位)从2000年12月31日至2001年2月6日,在台湾环岛行脚一周,其中风雨无阻,过午不食,随缘挂单或方便夜宿,旨在“唤起民众的善良心性”。沿途居士大力支持,纷纷供斋食及饮水,特别明古村居士群在林明华居士领导下,皆以护法的精神,始终如一地为行脚僧人排忧解难,除了面对沿途民众的询问做了大量工作,还默默地做好后勤保障,当行脚僧人圆满完成任务,列队进入台北惠光寺时,“中华佛教居士会”常务监事代表供僧,惠光寺信众代表也以日常用具等供僧,再由大乘精舍乐居士供行脚僧团5万元、斋僧1万元。再如有的居士义卖筹款弘法。如“国画大师”蒋青融居士将其珍藏品六幅梅花义卖,每幅20万元,义卖款供监狱弘法之用。六是积极参加佛教界组织的各种护法活动。如2001年3月,为抗议阿富汗毁佛事件,台湾佛教界在“中国佛教会”三楼举行座谈会,众多居士代表参加,“中华佛教居士会”代表乐居士在会上提出四点建议,得到与会者共鸣^①。七是居士以个人行动进行护法。最有代表性的如嘉义县施嘉信居士发起“救台湾要靠佛弟子”的全岛宣传活动,他从嘉义县朴子市出发,到各地去宣扬这种理论,他认为:“目前台湾剩下的唯一净土,就是宣扬正法的道场,但是除了出家众外,能长时间亲近道场的佛弟子,为数有限。政党的恶斗,会让恶质文化更加严重,‘台独’主战气焰逐日高涨,盲从的群众也随声呼应,如此下去台湾将成为台湾人民的坟场。因此要拯救台湾,只有靠佛弟子站出来,并付之实际

的行动才有可能。只要佛弟子先透过目前自己能用的媒体管道,开始讨论如何建立民主贤能‘政府’,就能逐渐引起民间学者与媒体的注意与讨论。这种声势一旦行成,台湾就有救了。但愿佛弟子能响应这个诉求,才能用佛法让台湾转危为安。¹⁶施居士的想法或有可商榷之处,但他对佛法的倚重、对护法的倾心也可见一斑。

(四)居士修法。一是团体修法。即整个居士团体集体修法,或以区域为团体,或以企业为团体。有代表性的企业团体如成立于1989年的电信学佛会,有严密的组织章程,选出的理事等召集人可以连任。他们十多年来如一日,长期坚持集体修法,具体活动如:1、定期共修,这是最主要的修法活动,主要利用从星期一至星期五的午休时间,或念佛,或诵经,或拜佛,星期三中午有的则参加禅坐共修,至1993年后,又增加了每星期二中午研讨佛法(如讨论佛教经典,包括《学佛三要》、《法句经》、《学佛群疑》、《学佛知津》等),这些活动从不间断。所以能坚持下来,共修者认为集体共修效果远超个人:“实在说来,在上班午休空档,聚众共修,诚非是最佳的选择,一者没有寺庙庄严的摄受力,二无充裕的时间,再者缺乏师父的领众,这些是美中不足的地方;但从它方面看,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心灵熏修的活动,理由如下:基于同事摄的胜方便,大家是共事的立场,相互学习,给予有心学佛的人,有机会体验共修的好处;同时大部分女同事们上班之外,又得忙做家事,另一半未许可学佛的情况下,我们提供了她们这个选择;在局内咫尺的距离,不劳远行,对于无法到外面道场共修的莲友,的确是个弥补;又集合大众之力,相互摄受,其胜力远超个人独自用功。¹⁷共修者还感觉共修后法喜充满、心渐开朗:“自去年起,有缘参加电信学佛会,每周五天与师兄、师姐们共修、念佛、拜八十八佛、随喜布施,及看到每位师兄、师姐发出的爱心,使我法喜充满。以前常跟母亲至寺院参拜,对于佛理不甚了解,如遇不如意之事,即易发脾气,难过很久。自从参加电信学佛会以来,凡事渐能以宽容心来包容一切,使身心渐而开朗。但愿以欢

喜心,广结善缘,共行菩萨道。¹⁸2、请法师或居士莅临本会演讲。应邀前来演讲的法师和演讲的题目如:法鼓山创办者圣严法师《学佛与人生》、《推动佛教教育建设人间净土》、《生活中的禅》,中华青年佛教会会长宏印法师《歧途与正道》、《菩萨道与解脱道》,美国万佛城宣化法师《科技时代应有的人生观》,慈济功德会创办者证严法师《人生要有生命的清流》,美国佛教会副会长显明法师《学佛的基本观念》,净化社会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净耀法师《快乐的人生》,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会长继程法师《禅与净》,以行医弘扬佛法的大醒法师《如何回家》,创办金色莲花表演坊的如空法师《从人性到佛性的净化》,在法国创立梅村提倡正念禅的一行法师《生活禅的艺术》,负责辅导大专青年学佛社团的果竣法师《用禅法来安身、安心、安家、安业》等,应邀前来演讲的居士和演讲题目,如时任“总统府资政”林洋港《我的人生座右铭》,时任“监察院院长”陈履安《生活中的修行》等。3、集体朝山参访。在参访同时,请寺中法师开示。以1996年为例,前往朝山的寺院有松山真光禅寺、苗栗铜锣九华山大兴善寺、新竹壹同寺等,前往参访的寺院有新竹福严佛学院、新竹慈济联络处等。4、每年举办一次年会。每次年会,大约都在佛诞日的稍后,一般都礼请著名法师来主持和开示,所以也称法会。以1997年举办的年会为例,以药师上灯法会的方式,作为这次年会活动的主题。佛光山住持心定法师带领普门寺十余位尼师前来,除了开示外,并举行消灾延寿药师佛上灯法会。心定法师作了一个多小时开示后,开始带大家学唱弘法歌曲。四点半左右,开始上灯法会。年会上将大众所缴的钱做了以下布施:赞助大陆弘法4000元,励馨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帮助雏妓、性侵害受难者)5000元,十方大法禅寺(青少年辅导中心)6000元,佛教慈济基金会大林医院建设11850元,三峡普贤寺(残障育幼院基金)6000元。5、撰写研修报告和学佛心得。研修报告主要谈通过共修后对佛法的理解,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佛学涵养,篇幅较长;学佛心得主要谈通过共修后的一孔之见,或通过一件事来表达自己的学佛后的体会和

认识,为随笔性质,篇幅较短。这两种文章写完后都择优发表在电信学佛会的年刊上,在会员中交流。二是闲散型的共修。即或三、五人,或七、八人,往往利用某居士热情好客及较宽敞的房子,共修时间不定,共修内容不定,闲时多修,忙时少修,处于一种闲散型状况,这类情况在台湾也较为普遍。如台中乡间有一独门独院的“咖啡小屋”,主人对学佛有兴趣,利用自己宽敞的住房和清幽的环境,组织周围居士前来共修,并热情提供咖啡及茶水等,虽然时断时续,但也长期坚持下来,自觉受益匪浅。三是由法师主持共修。以法师为核心,定期按计划主持居士共修,这类现象在台湾也较为普遍,如首愚法师长期在台北、台中各地亲自主持共修,制订有周密的计划。有的有固定场所,由法师长期指导修法,如南投集净宗普觉精舍专修净土,由法师带领居士共修,从清晨五点至晚上九点,每日不断,为满足不同居士的需要,备有五个区域供居士自行调整,如有绕佛区、拜佛区、静坐区、小佛堂诵经、视听教室听经闻法等,每月第四周为精进周。四是由居士主导的各种共修。这类共修有多种,有的收费,有的不收费;有的纯为修法,有的与锻炼身体相结合。以某密集式初级禅坐研习班为例,收费,每期为二天,由居士主持,研习内容为:1、四圣谛;2、止观、止观双运之道;3、为何悲智双运;4、如何调食、调睡、调身、调息与调心;5、动禅与静禅实习;6、重要法门(无为法、有为法)介绍与实习;7、昏沉、散乱、掉举、沉没之源由与对治;8、日常生活之活用;9、修持要领归纳。五是居士找出家人共修。有的居士居家条件较好,或拥有较好的修行场所,出于自己修法的需要,也出于对出家人的恭敬,礼请出家人前来静修。六是居士在家中独修。这类现象在台湾也大量存在,房子有空余的居士往往专备有一间佛堂,以供修行之用。七是有意吸收社会上弱势群体(如长期病患者)的居士加入修法队伍。如观音念佛会成立以来,在常住师父引导下,除了早晚课诵外,定期举行药师、拜忏法会,并于每周三、五分别恭诵《普门品》和《金刚经》。他们还吸纳了安养院的病患者一起修行,“齐聚一堂的患者中,有中风经

年的老人;也有遭逢意外而终身瘫痪的年轻病友,在义工逐字、逐句耐心的指导下,渐渐都能敞开胸怀,融合大众。每当钟鼓、木鱼、梵音响起,在众人的和声中,但见病患童颜般专注的神情,谨慎小心地开阖着久闭的唇齿,容或五音不全,却惊觉轮椅上瘫痪的肢体,跃跃欲试地舞动着无言的招式,浑身上下使劲卖命而渴望融众的热切,绽放生机,令人动容。^[9]

(五)居士志工。“志工”即志愿义务从事无偿服务的人,早期一般称作义工,后“内政部”于1989年颁布《志愿服务登记证登录使用要点》中对志愿服务人员,简称志工。因为“义工”是指义务帮忙,有点强迫性的色彩,而志工是依自由意愿参与服务,是自动自发的精神非外力逼迫。之后,对志愿提供时间及专长为他人服务的人都称“志工”。居士志工的崛起是台湾佛教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其人数之多、涉及面之广、所承担任务之重、工作热情之旺盛、工作时效之持久、工作之全心投入、工作效益之高,为任何群体不可比拟。甚至有的人干本行工作都不如当志工投入,不少人干其它工作有时还要计较一番,当志工却义无反顾,任劳任怨。可以说,台湾佛教界许多事情如果没有居士志工的介入和支持,是根本做不成的。这是因为“奉献就是修行”已深入人心,“施比取更有福”已得到大家的认可。当志工的很多是成功人士,但他们在志工队伍中绝不谈自己的成功,而是默默奉献,无条件全力以赴地工作,认为能为他人服务是一种福气,所以要感恩,感谢别人接受自己的服务。此外,大家都珍惜志工活动,在志工的队伍里大家感到很温暖,心灵得到净化,这是因为凡是加入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不是为名利而来,是为奉献而来。尤为感人的是不少残疾人也踊跃参加志工队伍,有一位失去双臂的青年在慈济台中分会任基金总务,他不但能胜任工作,下班后还当志工,在他脸上洋溢着对生活的自信,对未来充满希望^[10]。一位16岁时因误触高压电而导致失去双手、右小腿及右眼视力的青年,也参加了慈济的志工队伍,到医院当志工,到慈济高中志工营去讲课,引起极大震撼,他本人也在志工队伍中受到熏陶,在为他人

奉献中得到满足，他表示：“我一定要活得更意义、更有朝气，甚至要活得对别人有帮助。”^[11]志工队伍的工作使他在为他人付出时心存感恩，他认为：“自从我担任志工以来，便有一种体会：不要拿我们所拥有的，去衬托别人所没有的。我总是以感恩之心来看待事情——感恩让我学习、让我体会。”^[12]

居士志工有多种形式，一是有严密的组织和一定的规模。其加入有一套严密的手续，平常的管理也有严格的规定和章法，佛教慈济功德会中有各种志工队，以最有代表性的“慈诚队”为例，这是一个全部由男性组成的义工团队，有统一的制服，队员一般是被视为理想的丈夫与父亲的好男人，他们在慈济活动中主要提供的服务，包括：维护活动的交通和安全、维持各种活动（如义卖）的次序、搬运、开车、分会的巡守、对“委员”的协助等；此外，还要参加许多社会上的义务工作，如每星期义务参加一次社区的“资源回收”工作，即开着自己的小卡车，到几个固定地点，一方面做垃圾分类，一方面搜集街坊邻居可回收的资源，并将回收所得捐做慈济的慈善基金，这项工作“是可以让五个大汉汗流浹背辛劳地工作八小时以上。”^[13]要想成为“慈诚队”的正式队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与所有的慈济人一样，必须遵守“慈济十戒”，即：不杀生，慈悲喜舍；不偷盗，诚信信实；不邪淫，夫妻守分；不妄语，口吐莲花；不饮酒，身心轻安；不嚼槟榔、戒烟酒；不可赌博勿投机；孝顺父母声色柔；交通规则切遵守；关心政治不介入。其次，必须有两位正式“慈诚队”员推荐，并经过一年的培训和考核。再次，必须通过分队长及大队长在某些事项上的考核，像“慈济十戒”、定期的参与与其它队员合作相处的情况。最后，还必须分会中队长和大队长的认可，并进一步得到总会的同意等。参加慈济志工的人所以越来越多，是因为人们从中得到快乐，其想法诸如：“帮助别人我很快乐”、“从做的过程中，我感到法喜充满”、“虽不认识但帮助他，自己会很快乐”、“给他们快乐，自己也有快乐”、“做的很快乐，就象在天堂一般”、“乐在工作舍不得离开”、“现做现赚快乐，让人很有成就感”、“我也是个能

给的人”；有的认为对自我成长有益：“从中尝到许多新观念”、“学到不少生活中的智慧”、“担任干部而学到如何承担责任”、“志工经验对成长很有帮助”、“帮助别人也可顺便学习”、“是个自我磨练的好机会”、“利人又利己”，还有的产生了一种使命感，认为：“我们是他们的希望，不能轻言离开”、“希望自己微薄力量，能来散播善的种子”、“我们是一股社会上的清流”。二是在社会上公开招募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志工。这些专业技能的志工如电脑编排、刊物编辑、图书管理、医生护士、修补佛像、修理驾驶汽车等，其招募简章的内容，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宗旨、工作目的、工作范围及内容（对专业的要求）、服务时间及地点、对象（限定要清楚）、志工权利、志工责任、甄选（过程、方式、条件）、报名方式及附报名表、奖励与福利、权责划分、止聘。应聘志工的动机有各种各样，以香光尼众佛学院图书馆的居士志工为例，其无偿奉献的宗教性动机如：1、阅藏开智慧。古德云“翻阅藏经有不可思议功德”，志工认为来图书馆是一种接触藏经、佛书的机会，藉此多熏习可开智慧。2、培福的信仰。来当志工的居士确信“三宝门中福好求”，在佛门奉献服务，可以培植自己的福报，让自己更有福气、德行，是累积阴德的机会。3、广结善缘。通过与人接触，结交善缘，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使人缘更广，获得更多方面。4、藉事练心磨习气。古德云：“在佛门里做事是一种修行”，志工藉由做事来磨练自己的心志，考验心性，改变不良习惯。5、法施理念。志工认为通过图书可以将佛法之义理施予别人，在图书馆工作最有机会做到“法施”，尤其是从事参考咨询工作，帮忙读者找资料，是一种以“法”布施成就别人开智慧的服务。6、感恩回馈心。可将自己所获得的利益推及给更多人受益，让自己的生命得到成长而激起愿意奉献回馈之心。7、结交善知识。希望藉此结交良师益友，成为修学佛法的善知识，彼此互相增益学习。8、消业障的信仰。相信积聚功德可以改变运气，将过去所做不善行为消除。9、随喜功德。出于善心助人，若有人相约则跟随去，无其它目的。10、还愿的心。这是一种酬谢的心态，将信仰当成

利益输送的工具,若能满足所求,则愿意奉献^[14]。图书馆以什么来回馈志工呢?香光尼众佛学院图书馆藏主认为:“佛教图书馆大多数志工都希望藉由工作中得到宗教性的提升,如:亲近善知识、体证佛法、帮助自己修持菩萨道等。所以有形的奖赏则较为其次,但管理者若能适时口头致谢,关怀其修学,或是带领参访善知识、参加研习活动、举办成长营、读书会使其获得法义,将是对志工最大的鼓励与支持。”^[15]三是因活动需要而临时招募。如举办大型法会、各种大型典礼活动、大型游园活动、义卖活动、环保活动、赈灾活动、各种学佛营等,对这种临时招募的志工,一般都提供餐点,有时还随缘致赠些结缘品。四是社区志工。这种志工带有自发性,即居士们以社区为单位,或走进社区医院帮忙,或到养老院奉献爱心,或相邀街坊邻居出钱出力结合助人团队,或努力提升社区生活品质(如保护老树、绿化环境、清扫卫生、认养公园、资源回收、整治河道、大型讲座、书画展览、音乐欣赏、戏剧演出、户外踏青等)。以高雄冈山地区慈济环保志工的资源回收工作为例,每月第一个星期日被定为冈山地区的资源回收日,这一天,全镇二十个里的150多个慈济人,总会准时地相邀集合至各回收点,将垃圾分类回收,在鼎盛时期,曾有次动用了六部大卡车运载纸类、三部大卡车运载废铁和瓶子,才处理完毕。回收的所得全纳入社区基金,造福里民,更让大家有共同为社区付出的向心力。一位资深志工说:“一起做环保,不仅使居民之间的感情变得更融洽,无形中,环保的观念深植至每个家庭。”^[16]五是长期对口志工。即由宗教界组织志工长期到某部门定点服务。如大乘精舍组织的居士志工团体——大慈服务队,长期进入市立医院当志工,根据不同病房的病人进行不同方式的服务。以都是孤寡老人的第一病房为例,除了从简单的帮他们洗澡、擦洗、理发、刮胡须、修指甲等工作外,还要进行感情交流和心理疏导。由于他们都是长期慢性病患,久卧病床,非常自卑,要开启他们封闭的心胸、双方建立信赖与信心,有一定难度。志工们不厌其烦地进行了大量的善意沟通、倾听、关怀,感受他们的一

切,并视他们为亲人长者,使他们逐渐接受了志工,在每周固定的日子里,迫不及待地等候志工的到来,就像等候与朋友的约会。有的病患者因失去对生命的希望,在长期病痛的无奈无助下,情绪极为沮丧,志工们以感同身受的想法来安慰他们,再以耐心、爱心、信心等人性关怀来鼓励他们,只希望他们在生命的这段步伐走得自在些。由于志工们都是居士,皆以佛教信仰来处理他们的后事。“这其中不免遇到往生者、无力安葬者,凭藉佛菩萨的力量,能为他们募集些丧葬费用,甚至亡者穿着衣物等所需用品,希望他们也能走得体面点、自在点,为彼称念佛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17]志工们从对他人的服务中感到自己人生价值的体现,无不感到自己是最大的收获者。一位长期在第一病房服务的居士志工说:“对于从事义工,需秉持学习的精神,积极参与的决心,全心投入的意念,活在每一个当下,把自我全部掏空,拿掉那些自以为是的尊严,放下身段,甚至提起那份不敢爱人的勇气,要提得起,这就是一份大爱与大悲。当见身上的汗水夹着泪水的时候,才感觉是收获的最多。好比我们两手各拿着一个苹果,如果无法放下一个,又怎能拿到更多更大的苹果呢?在这多年的义工生涯中,即是我人生旅程中获得学习的转折点,能够学习待人处事,尊重与包容,充实自我,培养达观精神,也许这就是别人说我开朗的原因。妇女同胞拥有最大的可塑性 with 韧力,如果可以投入义工的行列,将是非常的适合;不论是医院、老人院、精神病院或是学校等,在您付出的同时,最后获益的将是自己。”^[18]六是长期关系户的志工。这类居士志工并无严密的组织,也无固定的活动目标,更无定期服务的对象,但由于与寺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或为寺院某法师的信徒、或常参加寺院法事活动、或即居住在寺院周围、或家中有亲戚在寺院出家),一旦寺院有事,召之即来,来之能干,效益之高,皆大欢喜。如台中慈光寺常年请祖国大陆学者来台湾交流,有时一年好几批,每一批都有几十人,且都要根据需要分散到各地考察,慈光寺召集了与之有关系的诸多居士来帮忙,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这些居士志工开着

自家车,兴致勃勃地前来服务,有时连续几天忙到深夜,有时直接影响了本职工作,但这些居士志工始终无悔无怨,工作一丝不苟,热情如一,令人赞叹。

必须提到的是,由于志工来源充沛,对志工服务的项目被推到极致,一些本不应该由志工承担的项目也由志工承包了。如慈济中区分会盖护理大楼,后勤工作本应由工地派专人负责,但却由慈济志工承担了。用餐时慈济志工站在餐厅门口,向工人递上擦手毛巾,要求工人做到五点,即:不吸烟不嚼槟榔不讲脏话、不赌博不投机取巧、孝顺父母、遵守交通规则戴安全帽、不参与政治活动不示威游行。工地上志工分好几组,有烧茶水的,有炒菜的,有煮饭的,个个精神饱满,认真负责,力图以自己实际行动感染工人。

台湾解严后居士团体的勃兴有多方面原因:第一,台湾解严前悠久的居士佛教传统的影响。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许多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不同经历的居士来到台湾,他们根据自己的条件,联合台湾居士,不同程度地开展护法、弘法、修法等活动,在台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今后居士团体的勃兴奠定了基础。有代表性的如李炳南、李子宽、赵恒惕、李添春、张清扬、朱镜宙、钟伯毅、南怀瑾、周德宣、蔡念生、于凌波等居士。以李炳南老居士为例,他1890年出生,1986年去世。1949年作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府主任秘书”身份来台,当时个人住处尚未安顿,就在基隆码头发愿表示,要将阿弥陀佛的名号传遍台湾每一个角落。开始他在法华寺弘法时,听众一度仅剩3人,但他仍然乐此不疲,持之以恒,终于打开局面,不仅听众急增,还开展了大量的弘法慈善活动,并于台中创办了佛教莲社。从1955年起至1985年,李炳南陆续在台湾各地成立布教所、莲社、念佛会合作寺院及公益场所,计有:崙字布教所、太平布教所、鹿港布教所、慈光图书馆、雾峰布教所、慈光育幼院、般若精舍、菩提仁爱之家、员林布教所、水滴莲社、丰原布教所、明伦社、后里布教所、净庐念佛

会、佛陀教育基金会、青莲念佛会、澹宁斋、净业精舍、金刚寺、卓兰布教所、本净寺等^[19],为居士团体的勃兴、为“人间佛教”的兴起起了某种意义的示范作用。正如有台湾学者指出:“随着崛起于日据时代的台湾佛教四大法脉,在光复后日益式微,而大陆来台僧侣或其门人开展的‘新四大法脉’(佛光山、慈济、法鼓山、中台山)尚未稳固之际,李炳南所领导的居士团体,早已在中台湾稳健地发展,并陆续建立了莲社、慈善等相关道场及机构,至今仍未有白衣能出其右者,就算僧侣亦不遑多让。或许可以说,净土念佛在台湾光复后,一直占据着佛教信仰人口的主流,与李炳南的全力提倡有着相当重要的关系。以净土念佛为核心的李炳南,会通儒佛、‘援儒入佛’,开创出具有个人特色的‘人间佛教’,这种‘传统’、‘保守’的性格,并没有因为‘向往他方净土’,而放弃建设‘人间净土’,这也充分表现出台湾战后‘人间佛教’的共构性与多元面向。”^[20]第二,都市化的生活使居士便于集中。随着台湾由农业社会急遽向工业社会转型,都市化生活在台湾越来越普及。由于居住相对集中,且交通工具也较为便利,为召集居士提供了方便。特别一些根据居民居住点建的各种“莲社”、“居士林”、“斋堂”等如雨后天春笋般涌现出来,让居士们很方便地就可以找到共修的场所。此外,都市化生活也为居士们交往提供了便利,许多人参加居士活动,就是因邻居关系,一个介绍一个而加入的。第三,社会现实使信仰佛教的人增多。台湾解严后,随着权威体制的崩溃,人们原有的信仰基础也轰然倒塌,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信仰又成为必不可少的精神需要,此时走“人间佛教”道路的台湾佛教善于贴近社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于是念佛修行蔚然成风。此外,台湾社会治安急遽恶化,各种前所未闻的事件层出不穷,许多人于无奈之际,将希望寄托于教人“慈悲喜舍”、“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佛教,正如施嘉信居士在《救台湾要靠佛弟子》中说:“打开电视,大家所看到、所听到的新闻报导,要不是政治人物缺德的口水战,就是名人的八卦;要不是谈丰胸,就是谈壮

阳;要不是辣妹秀,就是猛男秀,甚至连国际性的展示中心,都成了脱衣舞场的秀场;要不是吹捧有钱人的奢侈浮华,就是贫穷人的自杀悲剧;要不是毒品枪炮,就是古惑仔的凶残杀戮。这就是‘缺乏生命与灵性’的当代台湾文化,正是魔鬼波旬所展现的胜利果实。^[21]施居士因此提出只有佛教才能救台湾。施居士的看法在台湾颇有代表性,佛教成为台湾民众最乐意接受、也最放心的宗教,如家长们都普遍认为“学佛的孩子不会变坏”,热衷于送孩子进各种“学佛营”;有的竞选者为了表明自己与佛教的关系,在竞选演说时故意闪烁其词地表明自己是慈济功德会的“荣董”、“委员”、“志工”等。第四,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民众走进佛教奠定了基础。经济宽松后,不必整天为吃穿发愁而拼命工作,有了闲暇时间去参修佛法 and 当志工;特别是经济上有余力参加供僧等活动,以台中市三宝护持会募集供僧款为例,每次都非常顺利,大家认为这没有什么负担。经济上的宽裕,使组织各种护法活动变得既简单又容易。第五,周围环境的影响。随着佛教在台湾的迅猛发展,民众接触佛教变得极为容易,似乎佛教已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不管你想不想接触,佛教无时不在:走进寺院,各种法会和各种活动一个接一个;走进佛教场所,大量的佛教刊物、佛教宣传品等几乎随处可见,任人索取;走进各种讲堂、精舍,各种佛学讲座和共修活动一场接一场;走进素食馆,几乎家家都备有经书结缘品;打开收音机,不同频道的佛教节目在同时播出;打开电视机,一天24小时有佛教节目;从幼儿开始,寺院办的各种幼稚园比比皆是;在学校,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种“学佛营”已成为每年寒暑假不可或缺的内容,大学中的佛学社团更是如雨后春笋;在单位,有以本单位人为主的各种学佛会、共修会;在住处,有以区域为特征各种居士林和念佛会;在社区,有人前来相邀参加环保慈善等志工活动;甚至在家中,或许不时也有人前来询问是否愿为佛教慈善事业捐款。在这种环境气氛下,想不成为居士都难。

(本文为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台湾佛教与台湾社会的变迁及台湾佛教的现状、走向和

我们的对策》阶段性成果,本刊略有删节)

【注 释】

- [1]《菩提树》1971年出版,总第227期。
- [2]佛光山宗务委员会:《佛光山开山30周年纪念特刊》,佛光山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5月16日印,第373页。
- [3]林清玄:《浩瀚星云》,圆神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12月版,第276页。
- [4]《慈云》1997年9月号,总第255期,第77页。
- [5]《慈云》2001年3月号,总第297期,第50页。
- [6][21]《法宗时报——宗教新闻》(电子报)。
- [7]净引:《诵经、念佛、拜佛共修》,《电子学佛会年刊会讯》(1991年度),第44页。
- [8]得佑:《学佛的好处》,《电子学佛会年刊会讯》(1991年度),第60页。
- [9]《“观音念佛会”周年感言》,《妙林》1996年2月29日出版,第8卷2月号,第45页。
- [10]何绵山:《闽台文化探略》,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37页。
- [11]谢坤山:《在生命的转弯处》,《慈济》1999年8月25日出刊,总第393期,第71页。
- [12]谢坤山:《在生命的转弯处》,《慈济》1999年8月25日出刊,总第393期,第71页。
- [13]丁仁杰:《社会脉络中的助人行为:台湾佛教慈济功德会个案研究》,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7月版,第115页。
- [14]释自衍:《佛教图书馆志工管理》,《佛教图书馆讯》,1996年9月20日出版,总第七期,第3页。
- [15]同上,第5页。
- [16]黄秀花:《回收资源,也回收了邻里感情——高雄冈山环保志工》,《慈济》1996年11月25日出刊,第59页。
- [17]黄金枝:《生命中的第二春》,《慈云》1997年6月30日出刊,总第25卷第十二期七月号,第105页。
- [18]同上,第105—106页。
- [19]阚正宗:《重读台湾佛教——战后台湾佛教续编》,大千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266页。
- [20]同上,第277页。